“美国中心”格局中的霸主焦虑

——近代以来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三）

□ 张一飞

1991年末，苏联在经济危机、制度危机、组织危机中轰然解体，两极格局以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标志终结，世界进入“美国中心”格局。软硬实力的超然地位与近乎无限的扩张空间使美国成为人类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超级帝国，但是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世界霸主的光环背后，美国体会着无以言表的“霸主焦虑”（hegemony anxiety）。

霸主焦虑的两个来源

美国的焦虑感主要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霸权身份给美国带来的巨大责任压力——如何承担“全球治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无数地区霸权，在一定的文明和民族范围内进行区域治理，比如中国的东亚封贡体系，欧洲的神权认证体系，阿拉伯帝国的政教扩张体系。但是，一方面这些文明国家的经验不适用于主权国家世界；另一方面这些经验涉及的文化、政体、民族多样性有限，并非全球治理模式。换言之，人类没有任何一段历史可以为美国提供全球治理经验。反观美国自身，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商业往来几乎并不参与欧亚事务，甚至经常出现孤立主义政策（如门罗主义），在殖民地的争夺中也保持着审慎的态度，除美西战争外罕有敌对国家。进入20世纪后，如果德国没有在一战中推行无限制潜艇战，日本没有在二战中偷袭珍珠港，美国是否会尽早加入战争犹未可知。当这样一个年轻国家骤然成为世界霸主，世界每个角落突然全部与之息息相关时，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冲击——它不仅缺乏统筹全球的治理经验，同样缺乏承担责任压力的体验。霸权不仅意味着光荣，更加意味着义务（盟友集体安全、世界经济稳定、全球问题解决、国际政治和平等等），这对美国而言是日重一日的压力。

第二个来源与霸权身份为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相关——如何避免霸权丧失？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维持着全球最强大的军力，左右着全球货币流向，主导着几乎所有国际机制与全球议程，美国利益已经和世界利益融为一体，除了与世隔绝且仇视美国的国家和组织外，几乎没有任何国际社会成员希望美国走向崩溃。这一事实中所蕴藏的有形合作与无形预期为美国带来的国家利益是不可胜数的。但是，这也为美国创造了两个巨大困境：一是美国对外界依赖过大。这种过分依赖不是严禁开采国内石油或以政策手段大力保护国内就业可以解决的，美国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主权国家，更是一个世界利益转换器，一旦世界其他地方出现危机，美国很难不被卷入。二是美国无法转换角色。世界霸权的利益属性已经与美国血肉相连，一旦美国不再是霸权国，霸权福利的消失会使美国原有的稳定富足也随之而去。换言之，对美国而言，一方面有空前的霸权福利持续刺激；另一方面丧失霸权等于国家死亡，美国对于霸权被取而代之的担忧是人类历史上任何霸主的担忧都无可比拟的。

如何缓解霸主焦虑

责任压力与霸权利益带来的两大焦虑都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指出了相同的“明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霸权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因此，幻想美国如英国一般主动退下霸权王座，实属一厢情愿。美国不但不会允许自己失去霸权地位，还会不遗余力地防范任何有可能挑战自身霸权的国家或组织出现。具体来说，美国有一守一攻两种战略。

出于防守目的，美国要保持三个核心层面，即军事、货币、话语权，在全球范围内的绝对优势。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军费开支常年维持在世界首位，其军费数额甚至往往超过军费开支前十名国家中剩余九国开支的总和，并在全球各大战略要冲布置军事力量；美国主导各种国际金融组织，阻碍其他货币成为全球或区域结算货币，即使在经济危机美元信用评级下降期间，也不遗余力地使用各种外交手段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各类国际会议中，美国及其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主导会议议程的提出，利用其话语优势压制其他国家的合理需求，将国际“议题权”掌握在手中。表面上看，美国的这些行为咄咄逼人，锋芒甚盛，但是，这恰恰是美国的以攻为守的防御行为，目的是守住全球霸主的三条底线，即军事强制力、经济发展力和话语影响力，只要这“三力”在握，美国的霸主地位将不会因一时的外交失利或贸易逆差而受损。

出于进攻的目的，美国大力追求自身价值的“普世化”地位。美国降低其统治成本的根本之图，在于使整个世界“美国化”，使自身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成为世界正统，各个国家便可“自正其心”，唯正统国家马首是瞻。因此，美国的对外援助通常附带政治或经济改革条件，要使受援国整体或部分“美国化”方能安心。从文化角度讲，这种进攻战略，一方面与基督教文化中教徒的使命感息息相关，希望将“福音”传播至广；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二元对立”哲学的深刻影响，在这种哲学中，“不同”即意味着“斗争”，意味着一方必须消灭另一方，只有“同”才能长久兼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中国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对外援助也非美国可以理解。

综上所述，通过守住霸权底线和传播“普世价值”，美国试图缓解在“美国中心”格局中自身的霸权焦虑，但可惜其攻守战略都不会成功：就其防守战略而言，利用霸权遏制他国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并以此守住所谓“底线”，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的自戕行为。世界发展进度被放缓，首当其冲有倾覆之危的，就是和世界各部分息息相关的霸权国自身，而世界其他国家符合自身特点的军事、经济、设置议题等能力的发展也不可能被彻底遏制。

究竟什么才能缓解“霸主焦虑”？就历史大势而言，霸主国应该至少做到：宽容差异，舍己为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这三点，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他国尊敬、感激和回报，焦虑不攻自破。由于霸主国有更大的惩罚和奖励能力，不必过分担心其他国家选择背叛或失信，率先宽容和让步是霸主国战略魄力的体现。与之相反，无论现实主义的韬略看上去多么智慧，其本质是“损人利己”的哲学，这并不能增加霸主国的威信，反而会激发怨恨。人类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必将是共享共融、互利互爱，任何有悖这一潮流的哲学都将被历史抛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霸主焦虑”，也只是霸主在自我藩篱内的庸人自扰。

环球史话

（上接1版）

深入领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对象。治国必先治党，治党首在治吏。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做起，这是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执掌重要权力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也是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发挥示范作用的特殊职责所要求的。全会突出强调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要首当其责，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的作风和品格。我们作为党的领导干部，要以党中央为榜样，牢固树立“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意识，切实增强模范遵守党章党规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落实好《准则》和《条例》，为党员干部树立标杆、作出表率。

新华社是党中央“喉舌”“耳目”，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镇，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全社工作必须坚决体现党的意志、充分反映党的主张。要在认真学习领会的基础上，迅速、准确、全面地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到各项工作中。

牢固树立核心意识。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这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决定，我们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都要迅速跟上，在新闻报道和各项工作中旗帜鲜明地体现核心意识。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看齐，向党中央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项决策部署看齐，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号令，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要着力加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活动重要讲话的报道和阐释，把宣传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摆在最突出位置，不断推出有思想性和影响力的报道力作，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

坚定崇高理想信念。全会指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我们要把思想教育作为从严管党治党的根本，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持之以恒加强道德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要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切实增强“四个自信”，激励人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同心共筑中国梦。

牢记党的性质宗旨。全会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去根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发扬新华社记者“勿忘人民”优良传统，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深入社会生活、扎根人民群众，以群众为老师、以实践为课堂，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生动报道人民群众的先进典型，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坚决曝光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使新闻报道真正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

增强纪律规矩观念。全会指出，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重要保障。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新华社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镇，本质上是党的政治工作机关，必须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坚守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要严格执行党的宣传纪律，切实加强导向管理和阵地管控，把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落实到每篇报道、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把好各个发稿出口，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始终抓住“关键少数”。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做起。社党组同志要清醒认识到自己岗位的特殊重要性，带头践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的各项要求，并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自觉接受全社干部职工的监督，为全社党员干部作出示范。要通过扎实有效的措施，推动全社领导干部切实增强自律意识、标杆意识、表率意识，带头学习中央精神，带头抓好贯彻落实，带头遵守纪律规矩，带头接受群众监督，以实际行动贯彻好《准则》和《条例》。

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于落实主体责任。社党组要切实肩负起全社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履行好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领导责任，定期听取全社党的建设专题汇报、党风廉政建设专题汇报、职工思想状况专题汇报，着眼于解决突出问题，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坚持和完善社党组书记负总责、党组成员分工负责、机关党委具体落实、部门分社主要负责人直接抓的党建工作责任体系，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真正让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来、党内监督实起来，充分焕发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党员的主动性创造性，忠实履行好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

神秘失踪的铁牌

□ 徐佳

明太祖朱元璋提三尺剑平定天下，有鉴于汉唐宦官专权之祸，在皇宫门口树立了一块三尺高的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用这条铁打的规矩来警戒后世。明成祖迁都北京，也把这块铁牌扛过来了。后来，突然有一天，这块铁牌竟然“神秘失踪”了。此事调查多年，一无所获。

铁牌是怎么消失的

现在，让我们穿越历史，从故纸堆中寻觅蛛丝马迹，尽量还原事件场景，如果当年故宫门口安装了监控设备，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月光洒在雪地上。此刻已然宵禁，紫禁城里鸦雀无声，宫门口值夜的侍卫手握画戟，昏昏欲睡。

这时，墙内突然传来吟诗之声，侍卫们猛然清醒，喝问是谁，只见一个黑影踏雪而来，身披一件黑色大氅，侍卫们立刻将其团团围住。只见此人从袖中掏出折扇，轻摇了下，扇面上写着“忠勤体国”字样，众人连忙跪倒，齐声颂道：“请公公恕罪。”

黑影抖落大氅，抬头笑了笑：“都起来吧，今天谁带班？”早有一名小校近身跪下，口称“回公公话，属下锦衣卫百户宋五带班”。“宋五，交你一件差事。去，把你身后那块铁牌碎了。”听此言，宋五赶紧拼命磕头，台阶前的雪顿时一片殷红：“启禀公公，铁牌乃本朝太祖高皇帝御制，属下不敢擅毁。”黑影冷笑了一下，踱步过去，只见宫门口赫然立着一块黑色铁牌，黑影拿袖子拂去上面的雪花，露出几个大字来，他回头对身旁的一名小侍卫笑道：“我的儿，你叫什么？”小侍卫忙回话：“小的李七。”

突然，黑影脸色一变，厉声叫道：“有旨意。”侍卫们唰得一声全跪在雪地上。“奉皇上口谕：速将宫门铁牌碎了，钦此。”侍卫们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吭声。这时，黑影又笑了：“对了，圣上还有一道旨意，速将锦衣卫百户宋五拿了，锁送诏狱。锦衣卫李七办事勤勉，着任百户，钦此。李七，还愣着干嘛，办差去吧。”

第二天清晨，铁牌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在场的全部侍卫。这个黑影到底是谁？胆子如此之大？此人正是大明正统年间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几年之前他还是一个地方州学的学官，突然有一天进宫，当上了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的太监。在朱祁镇即位后，顺利成为太监头目，也成为明朝第一个专权的太监，他每次从宫门进进出出，都觉得朱元璋的铁牌刺眼，于是矫诏把它毁掉了。而几年之后，他簇拥朱祁镇亲征瓦剌，亲手葬送五十万明军于土木堡，提前敲响明朝覆灭的丧钟。（参见《明英宗实录》）

明代宦官擅权乱象

其实，即使那块铁牌不被王振毁掉，也只不过是废铁一块。这又是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有明一代宦官专权现象极为严重，那块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根本没有起到效果。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甚至说：“阉宦之祸，历汉唐宋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明之为烈也。”认为明代达到了宦官专权的顶峰。

明代宦官集团掌握的权力之大，也是让人瞠目结舌。择其要者言之，一是在政治上掌握“批红”之权，朝廷大事均由内阁用蓝笔“票拟”进呈，然后再由皇帝用朱笔“批红”批准。明朝中后期，皇帝普遍怠政，甚至数十年不上朝，于是宦官趁机攫取了“批红”大权，使“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二是在军事上掌握“监军”之权。在明初还只是临时派遣宦官到部队监军，正统年间，全国军事重镇“俱设镇守太监”。有意思的是，李自成围攻北京前夕，崇祯皇帝还组织北京4万名宦官军训，号称“净军”，宦官竟然成为皇帝最后的军事依靠，结果一触即溃、开门投降。三是在司法上掌握“厂卫”之权。明代宦官控制了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等特务机关，凌驾于三法司之上，直接逮捕、关押、审判朝廷官员，动不动就用廷杖来惩戒大臣，树立威信。四是在经济上掌握“监税监矿”之权。万历之后，宦官被派遣到全国各地，“吸髓饮血”，监管税收、食盐、采矿、采办、织造等重要经济事项，掌握了朝廷经济命脉。宦官还大规模侵占百姓耕地，且不向朝廷缴纳赋税。武宗时期宦官谷大用一人即侵占京畿良田万余顷，其他的大宦官更是可想而知。

规矩是怎么被打破的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明太祖定下了铁打的规矩，为什么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究竟发生了什么，规矩是怎么被打破的呢？

破坏大规矩往往是从破坏小规矩开始的。除了树立铁牌制定“大规矩”之外，明太祖还制定了一些配套的“小规矩”，比如在《钦定皇明祖训》里规定“不许宦官读书识字”。到了宣德四年，宫里却专门设立了内书房，专门教小太监读书识字，但竟然没有大臣对此发表异议，大学士还亲自跑去当老师。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是这类“小规矩”被一点点突破，“大规矩”才终于完全倒塌。

规矩的落实缺乏制度保障。明代政治制度在设计上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那就是缺乏对宦官的权力约束机制。整个宫廷的宦官均由皇帝一人统率，外廷几百家大小衙门对宦官群体缺乏管辖权和监督权，甚至宦官犯法，都由内廷审判，皇帝裁决。能不能管好宦官，只能依靠皇帝一人。规矩之所以为规矩，就在于违反规矩要承担后果。明代多次发生宦官严重干政的现象，文官集团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皇帝上书，要求皇帝予以惩治，但实际上却没多大效果。比如正德年间，户部尚书韩文上书“请诛乱政内臣马永成等八人”，皇帝没有采纳，反而更加重用这些宦官，却将韩文罢免。（《明史·武宗本纪》）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史书上的一段记载，似乎可以作为这段历史的一个注脚。公元1659年12月，南明永历小朝廷被清军追杀，从云南逃入缅甸境内，在那里，永历君臣住在茅草屋，衣衫褴褛，饥餐露宿，连最后几百名大明禁卫部队也全部被缴械。吴三桂的追兵隔着几个山头虎视眈眈，缅甸贵族也磨拳擦掌，计划生擒永历帝献给清军。而最让人吃惊的是，就在这种朝不保夕、势如危卵的环境下，大明最后的宦官头目竟然还因为一点小事，在茅草屋外当众廷杖大臣，作威作福。明代宦官干政真是坚持到了最后时刻。（事见《狩缅纪事》）当然，从本质上讲，宦官群体也是封建专制皇权的牺牲品。能够专权的宦官不过是千分之一，绝大多数都生活在深宫的底层，水深火热。而正是这千分之一的专权宦官，对国家的历史走向造成了恶劣影响。

反思这段历史，似乎可以归纳几点教训。铁打的规矩必须防微杜渐，不能对破坏规矩的“小事”视而不见；铁打的规矩必须有铁打的纪律来维护，破坏规矩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日常监督应有健全的制度体系。

有所思